

教材编写琐忆

辛 安 亭



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20
75

教材编写琐忆

辛 安 亭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教材编写琐忆

辛 安 亭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875 字数100,000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,000

统一书号: 7094·281 定价: 0.36元

写 在 前 面

陕西人民出版社很珍视老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资料和经验，准备出版这方面的书籍，曾向我约稿。我根据手头很少的资料和今天的回忆，写了一篇《编写陕甘宁边区小学及农村文化教材的几点体会》，连同在延安时写的十二篇有关文章，合成一册，书名为《教材编写琐忆》，交给出版社发表。

老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是我国革命工作的一部分；那时的工作经验，对于当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，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。本书是很小的一个角落的工作经验，希望它对今日为少年儿童编写教材的同志们，小学教师们和农村文化学校的教师们有所帮助。因此，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，我还是高兴地把它拿出来，就正于读者。

作 者

目 次

回顾在延安十一年的教材编写生活·····	(1)
编写陕甘宁边区小学及农村文化教材的 几点体会·····	(15)
今年儿童节的感想·····	(90)
《儿童作文》编者的话·····	(100)
《儿童日记》编者的话·····	(103)
旧《百家姓》与《新百家姓》——小学补充教材·····	(106)
谈谈高小自然课本·····	(109)
围着火盆谈天——小学自然课补充教材·····	(119)
关于农民识字课本的编法问题·····	(125)
冬学识字教学上的两个问题·····	(130)
群众急需字研究·····	(136)
怎样编写在职干部文化课本·····	(143)
二十四节气的解释——冬学补充教材·····	(148)

回顾在延安十一年的教材编写生活

(一九四九年春初稿，一九七七年夏修改)

接受了新任务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我来到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三个月的陕北公学生活，开会、唱歌、爬山、行军、听报告、出墙报……很快地飞过去了。七月一日，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日那天，我到了边区政府教育厅。

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，在党中央所在地工作，热情自然是很高的。教过七年中学，曾担任过五、六种课程的教学；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小学课本，劲头是很足的。当时领导上要我同时编写高小历史和地理教材，我稍加考虑，即承担了。先写出编写计划和提纲，经过讨论，接着就双管齐下，写几课历史，再写几课地理，积极地工作起来。写出一部分，马上审查、修改，立即油印发出，供学校使用。

当时编写的同志共四人，同住在一孔土窑洞里，除了集体讨论外，白天各写各的，很少说话；晚上直写到十一点钟，才熄灯上床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就又开始工作了，一天大约工作十一、二小时，并且天天如此，只感到愉快，不知道疲倦，全副精神都贯注在工作中。那种情景，今天想起来，还历历如在眼前。

贯彻抗日教育政策

当时编写教材的方针是什么？就是党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“抗日的教育政策：改变教育的旧制度、旧课程，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、新课程”（《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》）。如何贯彻这一方针呢？我们的口号是教材要抗日化。化法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是内容上增加抗日的比重，如历史课本第一册从九一八事变讲起，一·二八抗战、察北抗战、八一宣言、西安事变……一直讲下去。地理也把敌人对东北、华北资源的掠夺、各省的军事要地等内容，讲得较详。别的同志编的小学国语，更是如此，关于猫儿狗儿的物话，也都装上抗日的內容。

另一方面是在教材的组织编排上适应战时的环境。如历史课本的编排是先今后古，中外混合的。第一册讲“九·一八”以来的国内外大事，第二册讲中国近百年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，第三、第四册讲中外古代史。地理编排是中外混合，以战区分区，螺旋式地安排教材内容。第一册就把全国大体讲到，但重点是华北与东北；外国则讲与抗日关系密切的日本。第二册又是全国大体讲一遍，中心在西北与华中。这样编排的理由是：抗战时期，学生不一定能在学校住到底，注重教学当前最重要的知识，才好与战时生活相适应。

但是过了一年之后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陕甘宁边区更加巩固，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。于是群众的要求高了，对课本的批评也渐渐听到了：“猫儿也抗日，狗儿也抗日，一般的宣传材料太多，基础知识的教育成分太少，过分注重

当时当地，教材的编排太没有系统了。还是要考虑长远需要，讲点科学知识，注意儿童特点。”

科学化与儿童化

各方面对课本的意见不断反映来，编写的同志起初还不注意，渐渐地听的多了，才认真加以考虑。接着研究、讨论，认为别人的意见虽不免夹杂了一些传统的不正确的观点，但在纠偏的意义上还是对的，应该吸取，以求改进工作。于是一九四〇年又开始了改编工作。改编的方法是在贯彻抗日的教育政策，坚持抗日化的前提下，要着重一般文化知识，注意科学化与儿童化，长期性与全国性。

这套课本在一九四一年大半编写完了，宣传动员性质的课文大大减少，科学知识是相当丰富的。不仅历史、地理和自然，就是高初级国语，也包含了社会、自然两方面的许多知识。历史课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。前三册中国史，第四册世界史，都是从古到今讲下来。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几方面都讲到了，课文又力求中心显明，社会发展的前因后果都力图交代清楚；每一历史事件又叙述得简明扼要，具体生动，一字一句也再三推敲，力求妥当。儿童化方面，初级国语可说是一个典型。要求每一课达到既科学化又儿童化，内容是常识，表达用诗歌或故事形式。对课文，编写的同志费心真不少，有一些课文在技巧上当时认为简直是天衣无缝，实在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，我审阅时十分满意。

这套课本在一九四二年出版后，确也如编者所料，曾博得不少小学教师和关心教育的同志们的赞扬，认为是在新教

育方针指导下编出的一套完美的小学教材。

初步认识了洋教条

这套所谓科学化与儿童化的新课本有没有缺点呢？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我们才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。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中，逐渐听到一些对新课本的批评了，有的说：“新课本基本上还是洋教条”，有的说：“课本里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”，还有讲其他话的。编写的同志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、《反对党八股》和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文献，对照文件进行思想检讨与业务检查；意见是在不断听，常常在会议上争论，也常常在想问题。时间久了，头脑开了些窍，心里逐渐明亮起来。于是慢慢在完美中也看出了缺点，从无缝的天衣上也找出了破绽。

拿我自己编的历史课本来说吧，对历史事件的论断是否有错误，那是学术上的问题，且不管它。单就分量与内容说，那样重，那样深，小孩如何接受得了？即使取材妥当，组织严密，一字一句有讲究，但教师教不了，学生学不下，优点还不是只在书本上？革命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让学生学习的课本，结果学生学不下去，解决了什么问题呢？这些问题，说明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是从一些科学上的抽象概念出发，而不是从实际的群众需要出发，在主观愿望上是为人民服务，但在客观上却没有给人民解决问题。正如毛主席批评的：“做宣传工作的人，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，没有研究，没有分析，乱讲一顿。”（《反对党八股》）这不

是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是什么呢？

就拿初级国语来谈吧，试举两课如下：

麻雀偷米

一个雀儿来偷米，
偷了一斗一升一合米。
的儿的儿向南飞，
飞去又飞回。

十个雀儿来偷米，
偷了一石一斗一升米。
的儿的儿向南飞，
飞去又飞回。

这一课我们先前认为写的很好，因为它不但很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自然现象，而且还包含了石、斗、升、合的常识及其十进位的算法。同时词句流畅易读，生字反复出现，很适合儿童学习。但整风后的看法不同了：小孩子看着麻雀偷米还高兴地欣赏，那一定是不知生产艰辛的地主家的子弟；农民家的子弟是没有这种心情的，他们对偷米的麻雀只会憎恨，不会欣赏。因此，这一课的思想感情是不对头的，不符合工农群众的要求，阶级立场是有问题的。

另一课是：

马在路上跑

跑跑跑，马会跑，

马在路上跑，跑得快来跑得好。

飞飞飞，鸟会飞，
鸟在空中飞，飞得快来飞得好。

爬爬爬，蛇会爬，
蛇在地上爬，爬得快来爬得好。

游游游，鱼会游，
鱼在水里游，游得快来游得好。



这一课原先也认为是很好的，因为它有计划有系统地说明了几种动物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场所，而且生字、句调多重复，描写也很生动，适合儿童学习。这时的看法呢？当然也不同了。马跑和鸟飞两节没有问题，但鱼游与蛇爬就有问题了。鱼游，在陕北很少见，儿童没有亲切之感，这问题还小。蛇爬，陕北儿童都有经验，知道它是会伤人的，他们对蛇的情感是恐惧与憎恶，绝不会有“爬得快来爬得好”的感觉。原来这篇课文是拿国民党统治区大城市公园中的生活做背景写的，在那里蛇的活动有固定的区域，不会危害到看的人；而看的人呢，当然大多是些老爷、少爷、太太、小姐，至少也是中上层社会的洋学生，这些人才会感到蛇是“爬得快来爬得好”的。于是这一课的思想和阶级感情就又成问题了。

此外，对卫生，对礼貌，对生产，在国语中虽然讲了许多，但很多是不实际的，是抄来的洋教条。科学化不是建

立在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的基础上，不是从边区农村生产与家庭生活的需要出发，而是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上，是从抽象概念出发的；儿童化不是从广大农村的农民儿童的生活出发，而是从城市上层社会的儿童生活出发的。结果就脱离工农大众，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。这些都是教条主义的，是洋教条，而且有些还包含了剥削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。这些也说明，我们编写的同志在“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”（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。

结合实际的经验教训

一九四四年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教育的社论：《论根据地的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》和《论普通教育中的课程与学制》。看了之后，在整风学习中获得的对新旧教育的看法更明确起来。就教材来说，一方面从科学化与儿童化的外衣之下，看清了整风以前课本的教条主义实质与某些在阶级观点上的错误；同时对教材编写的结合实际问题有了初步的了解。认识到编写教材不应从主观愿望出发，而应从边区客观实际出发，要结合实际。

边区实际首先体现在政府的政策方面，因为革命政府的政策，不是随意决定的，而是根据政治形势，经过调查研究，集中了群众的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规定出来的。如支援抗战与发展生产是当时政府的两大政策，同时也正是群众利益的主要方面。

贯彻了政策观点，教育服从政治，教育为政治服务才不

是空谈，才有了实际意义。但我们过去是不懂这一点的，我们常常是把空洞的政治概念代替了党的政策。因此有的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写出这样的课文：“春种一粒谷，秋收千粒籽，农民没土地，仍旧饿肚子”。好象是要求平分土地了，这显然是违反当时党中央制定的减租减息政策的，因而受到了批评。后来把第三、四句改成“地主不减租，农民饿肚子”，才符合了政策的要求。

其次，边区实际表现在群众生活方面。群众生活是多方面的，比政府政策的内容更丰富。如切合实际的卫生习惯，反迷信的科学知识，待人的礼貌，做事的能力，这些虽与政策的关系不多，有的甚至没有关系，但都是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，教材对这些方面也必须有所反映。而且教材贯彻党的政策，一部分也还要通过群众的生活，才能具体表现出来，不能脱离生活抽象地去讲政策。

在此新的认识下，一九四四年我编出了供农村冬学用的《日用杂字》、《识字课本》、《农村应用文》等书。编写这三本书，费时并不多，每本不过一个月左右。编写的过程是先做调查，如访问农村，了解农民生活及群众的要求，收集农村流行的各种杂字书与应用文；然后再根据党的路线、政策对收集的材料加以研究和整理，决定如何取、舍、增、改；再后就写出初稿，请人提意见；最后斟酌修改完成。这个过程，说来也很简单，但与过去的编法是有很大不同的；主要注意力不仅是放在写作上，而且是放在研究我们的服务对象及其需要上。

《日用杂字》和《识字课本》初印出来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，以后年年再版，却经常供不应求。《农村应用文》

印数不及《日用杂字》等，但流行的地区却更广，各解放区略加增减翻印的版本，在延安见到的就有五、六种。

为什么《日用杂字》和《识字课本》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呢？因为它的编法适应了成年人和青年人的特点，不同于儿童识字教材的写法，采用篇幅简短而内容丰富，生字较多而不强求重复的形式，能够满足群众费时少而识字多的要求。《农村应用文》之所以受到欢迎，是因为写的简明、通俗，便于识了一千字左右的农村干部摹仿应用，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，起了“雪里送炭”的作用。

过去高小《历史课本》的失败与这次《日用杂字》等三书的成功，给了我深刻的经验教训。这就是，编教材时，注意力首先应放在调查研究、了解实际、掌握读者对象及其要求方面，不应放在研究书本、追求写作方法方面。

以上是结合实际的成功经验，一九四四年编写工作中也有失败的教训。当编写高初小国语时，认为教材要为政治服务，结合实际，就应紧跟实际，宣传新人新事、真人真事。于是课本从报纸上编选了许多各方面的模范人物与事件。当课本出版后，在教学过程中，真人真事有些起了变化，弄得很被动，不好处理，这是一次深刻的经验教训：课本与报纸不同。报纸每天出版，今天宣传这个，明天形势变了，不再宣传就是了。课本的编写与印刷过程很长，至少要半年，到学校又要使用半年。一年内形势与人事方面往往变化很大，一变化课本就不好办了。因此，课本不能象报纸，要考虑得稍远一点，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。密切结合形势的要求，应让学校自行处理。

结合实际的科学化与儿童化

整风前编的全部小学教材，在新的观点下看来，都有严重的缺点，需要重新编写。这种工作在一九四五年夏天调来几位同志后，才正式开始。用了一年半时间，全套课本便大体完成了。

这次课本编写前，一方面下乡，对边区小学与农村儿童做了初步调查，另方面对过去所编课本，也做了一番研究、检讨，做了较深刻的批判。在编写过程中，再次进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，有时还到学校或机关去调查访问。因此，这次编出的各种课本，都较过去所编的提高了一步。洋教条清除了，简单化的政策宣传、抄袭报纸新闻的现象也克服了。例如：

高初级国语，不但在形式上根据边区儿童的程度，注意了分量的轻重，生字生词的搭配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从边区的政治形势和革命需要、从儿童的农村生活和家庭生活出发，并使二者密切结合。如在国语教材中，注意了对学生进行革命观点、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的教育。初小国语教材中有近百分之三十的课文是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。这一方面是反映和配合了当时的大生产运动，同时也教育学生从小憎恶剥削阶级，热爱劳动，热爱劳动人民。再如初小国语的课文，不是象过去提倡每天洗澡，每顿饭饭后刷牙，而是针对边区儿童的几种最需要的卫生习惯，提出不吃青毛杏，不吃烂香瓜，不喝脏水，好饭不吃得过分饱等。再如高小国语讲破除迷信，不是简单地从正面讲科学知识，而是针对农村

流行的具体迷信加以分析批判，如对梦的解释，对毛鬼神、探家子的说明，对红孩儿女妖精的揭露等，结合批判讲科学知识，让儿童在破除头脑里的迷信的基础上，接受新的科学知识。

高初小算术教材，完全从实际出发，进行了很大的改革。习题方面不再出现利息、年龄、钟表等许多不实用的计算，而是把实际生活中最实用的算题按深浅分列在各册中。算术基本内容各部分的比重，也随需要的程度而做了调整，如百分数比分数用的多，教材内的比重就大一些，这与过去的课本相反；如面积中不规则地形的算法用处较大，就特别多讲一些。农村对儿童的算术主要要求能理解题，会运算，至于算的快慢，关系不大，放到第二位，因而将应用题的比重加大了些，式子题相应减少。又如把边区儿童玩耍方法中有助于儿童学算的，也有选择地编在教材里，虽属小事，也还是创举。

高小自然，打破历来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取材，而代之以农村生活，于是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说明，实用的生理卫生知识，边区正在提倡的农业与畜牧的改良方法，都成了主要内容；而单纯讲道理的电学、机械等科学与边区不实用的水产物等，分量就相应地减少了。高小史地，大大减少了分量，并采用简明的写法，比早先的课本容易学习得多了。每课的立场与观点，当然更是再三斟酌了的。

计划外的工作

一九四七年春，蒋胡匪军进犯陕北，我背着行李在安

塞、子洲一带的民办小学作调查。看到许多地方买不到课本，以致有教旧《三字经》的。我当时就地根据需要，用三字句形式，帮助编写了几段课文，后来传抄教学者不少。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回到延安后，把零星编下的整理修改一番，又补充了一些内容，把儿童最必要的思想品德与生活知识都包括进去，共分十部分，编成一本内容、体系都较完整的小册子，初次在延安出版，名为《新三字经》。

这本小书很快得到广泛流传，全国解放后，还先后有五、六个出版社出版过，改名为《儿童三字经》印发全国，一直流传到文化大革命前夕。这给了我一个明确的认识：一本通俗读物，如果要较长期地流传，应着重讲最基本的较固定的知识，不可过分强调紧跟形势，过多讲临时性的东西（任务是宣传时事的例外）。同时一定要做到篇幅简短，语言简明扼要，通俗易懂。

一九四八年春，边区军民把蒋胡匪军赶出边区以后，西北形势大变，将要全部解放了。为了准备迎接革命的新形势，各项工作都紧张起来，教材编写工作也不例外。我当时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边区小学教材编下了，农民识字教材也编下了，儿童读物也有了几种。但干部中的文盲、半文盲为数还很大，还没有解决教材问题。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《文化课本》的序言中说：“一个革命干部，必须能看能写，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，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。”毛主席当时是就机关干部讲的，边区广大农村的文盲半文盲干部，同样有学识字与学文化的需要。边区的劳动人民养活自己已达十年之久，自己是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，对农村广大干部这一问题不能解决，总觉得于心不安。